

1969年：中美蘇戰略 大三角形成的起點

• 代兵、張碧坤

摘要：1969年3月起，中蘇邊界地區不斷發生武裝衝突，剛剛上台的美國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政府意識到，這是在中美蘇關係中構建美國戰略主動地位的歷史機遇。在整個1969年，中蘇衝突為尼克松政府與中國發展關係提供了源源動力，美國終於在年底實現與中國的直接聯繫。同時，中蘇邊界衝突也令中國領導人重新考慮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外交在經歷了「一邊倒」、同時與美蘇敵對之後，進入新的調整階段。本文運用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與多勃雷寧 (Anatoly F. Dobrynin) 的回憶材料，以及中國官方檔案文獻，主要論述了此間中美兩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認為兩國在各自的對蘇關係中遭遇的困難，推動着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的形成。

關鍵詞：中國 美國 蘇聯 邊界衝突 戰略大三角

中美關係緩和是冷戰史研究的重要領域，繼1979年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的《白宮歲月》(White House Years) 出版後，1990年代美國學者紛紛發表著述，揭示中美關係緩和的歷史過程^①。二十一世紀以來，隨着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任內國務院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的開放，特別是2006年《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中國卷 (1969-1972) 的解密^②，為對中美兩國的外交過程進行新的詮釋提供了史料基礎。雖然這些檔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前人對這一過程的描述，但卻令研究更加具體細微。1969年是尼克松政府上台的第一年，中美兩國的接近在這一年如何開始，更成為不少中外學者關注的重點^③。

早在上台之前，尼克松政府就確立了這樣的戰略觀念：「美國的安全要求維持世界均勢，而中國是這均勢中的一個關鍵要素。」^④尼克松在外交理念中

賦予中國全球性戰略價值，那麼他是如何把這種理念轉化成外交行為的？1969年，中國和蘇聯在邊界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中蘇邊界衝突與中美關係的改善存在何種聯繫？以上問題似乎可以概括為：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是何時以及怎樣形成的？

本文運用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基辛格與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Anatoly F. Dobrynin）的回憶材料，以及中國官方檔案文獻，探討了1969年中美蘇三邊關係的互動。文章主要以中美蘇三邊關係的互動為切入點，而不是僅僅探討其中任何兩國雙邊關係的演變；同時評述了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對中國威脅的性質的判斷，指出尼克松政府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並不具有太多的軍事含義；最後運用新史料論述1969年秋尼克松政府如何應對中蘇之間可能爆發大規模戰爭。

一 1969年3月：中蘇、中美關係的歷史拐點

從1969年3月2日開始，在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上，蘇聯軍隊多次對中國邊防部隊實施武裝攻擊，並向中國岸上縱深地區炮擊，中國方面進行反擊。中蘇兩方均派出正規軍，各有人員死傷。由此，兩國關係從言辭上「對罵」發展成邊界上「對打」。

早在2月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注意到蘇聯在中蘇邊界的軍事力量不斷加強，「蘇聯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軍事力量及其指揮系統的升級已經超出維護邊界安全所需，蘇聯可能會在需要時對華北採取進攻行動」^⑤。鑒於中蘇兩國的緊張關係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對美國極為有利的戰略態勢，尼克松政府決定立即評估中國和蘇聯的軍事與外交政策，以期確定能否利用中蘇矛盾獲益。

2月27日，美國〈國家情報估計〉（“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指出，「近年來蘇聯的亞洲政策日益側重於遏制中國。中國力量的增強可能導致蘇聯對美國採取合作政策」，同時「蘇聯對外政策中對意識形態的強調在減弱，更加關心現實地緣利益。在這一政策轉變中，中國正從蘇聯意識形態的同盟國轉變為強大的敵手，並可能從整體上影響蘇聯對世界局勢的看法」，「蘇聯在短期內可能不會把中國視為重要威脅，但從長期看，莫斯科擔心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及中美接近，對此蘇聯將全力阻止」^⑥。美國也評估了中國的核能力，指出「共產中國已經具有地區性核打擊能力」。在中國的核戰略意圖方面，該情報認為：「中國肯定意識到，對鄰國或超級大國使用核武器存在很大風險，可能招致對中國的毀滅性核反擊。」^⑦

3月6日，美國情報部門專門評估珍寶島軍事衝突的影響：「毛澤東是中蘇達成和解不可逾越的障礙，中國不可能選擇繼續與美國敵對。在越南，中國幾乎肯定不會發起全面的軍事進攻，也不會在另一條戰線上引發重大衝突」，「中國的威脅在許多年內將存在於政治顛覆與支持革命活動領域——主要在東南亞地區」^⑧。

從對中蘇外交與軍事政策的分析中，尼克松政府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其一，中蘇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其二，中國對美蘇外交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導致蘇聯加大對中國問題的關注，蘇聯將竭力避免中美接近，並可能因此在對美政策上作出讓步；其三，雖然中國已經具備地區性核打擊能力，但中國在亞洲的威脅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軍事性的；其四，在中蘇發生軍事衝突的背景下，中國不會選擇在新的戰線上展開與美國的對抗^⑩。

中蘇邊界衝突的發生，似乎為尼克松關於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構想帶來了戰略機遇。早在上台之初，尼克松對中美蘇三角關係已有了初步的想法，他在與法國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會晤時說：「國務院存在着相當大的情緒，不僅支持美蘇關係緩和，也支持美、蘇、歐洲一起反對中國」，「從短期看這是個不錯的政策，但從長期看，美國的利益是把中蘇均視為大國，並與二者平行發展關係」。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理論上的，與中國建立關係非常困難」^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尼克松把中蘇相提並論：「把中蘇均視為大國」，「大國」的含義應該是指對美國全球戰略具有全面影響。無疑，這意味着中國在美國對外戰略中地位的重大提升。

當中蘇發生邊界武裝衝突後，尼克松政府進一步看到「平行地與中蘇發展關係」，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左右逢源的政策設計具有現實合理性，而這一政策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能否與中國發展關係。此時中美兩國最後一條聯繫渠道——華沙大使級會談也已中斷，尼克松從前幾任總統手中繼承下來的中美關係是相互隔絕的，要想實施利用中蘇矛盾的戰略，必須改變中美關係狀況，而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則加強了改善中美關係的緊迫性。中蘇軍事對抗也令尼克松政府認識到，即使中美暫時不能發展關係，中國也不會選擇與美國對抗，特別是在其最為關注的越南問題上，中國不會奉行進攻型政策。因此，越南問題對中美接近的阻礙作用應當淡化。這樣，在1969年3月中蘇邊境衝突的背景下，中美、中蘇兩組雙邊關係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前景：中蘇關係的趨勢是對抗的加強，而中美關係則有對抗逐漸減弱的勢頭。同時，尼克松政府也意識到蘇聯的對美政策可能會因為中蘇邊境武裝衝突而發生變化，中美接近的前景可以促使蘇聯在對美政策上作一些讓步。

另一方面，1969年2月，中國的對美、對蘇政策也在醞釀調整。2月7日，毛澤東意識到尼克松上台後國際形勢可能發生變化，美國對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正在減弱：「〔美國〕這幾年注意力放在越南，被越南問題纏住了，來不及顧及別的地方。」^⑫19日，毛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葉劍英等人談話時說：「你們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國際問題有些怪，美英報紙經常吹蘇聯要出兵問題。蘇聯要在遠東搞演習，又不聲張。」同時，毛還提醒四老帥要注意西方國家的動向：「最近意大利、加拿大要承認我們……研究國際問題要注意那一些我們不注意的國家。」^⑬

3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當然也引起中國領導人對中蘇關係以及國際形勢的思考^⑭。15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等人說：「總感到要打仗……九大這個會要準備一下，不準備真打起來怎麼辦？」^⑮但

是，毛也認識到中蘇由珍寶島衝突引發大戰的可能性不大。22日，毛在與陳毅等人的談話中指出：「我是比較樂觀的。2號的衝突，他們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有討論。」毛問林彪：「文件（指九大政治報告草稿）你看了沒有？國際邊境事件不要講得那麼嚴重。」^⑮毛還指出當前中國在國際局勢中處境不利，應當認真研究國際局勢，謀求破局脫困：「緩和一點好，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⑯毛再一次問陳毅：「你們研究國際問題怎麼樣？」^⑰

從2月7日到3月22日，毛澤東發表多次關於國際問題的談話，從中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思想：其一，中國在國際上處境孤立，需要破解困局，因此他兩次指示老帥研究國際局勢；其二，美國對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減弱，而蘇聯的軍事威脅正在增加，雖然大戰不是迫在眉睫，但不排除戰爭可能；其三，西方一些國家開始向中國發出緩和信號，應當關注。這些迹象表明中國高層領導人在考慮調整對外政策，而大洋彼岸的尼克松政府也在研究對華政策的各種方案，緩和對華關係已經在總統的思考之中。1969年2月1日，在致基辛格的備忘錄中，尼克松提到：「我想我們應該鼓勵此種態度的發展，即本屆政府正在探求與中國緩和關係的可能性。當然，這種鼓勵應當私密行事，不宜付諸報端。」^⑱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根據總統指示評估對華政策的各種可能性方案。可以說，隔洋而望的中美兩國在1969年2、3月間表現出相向而行的政策端倪。

二 中蘇矛盾持續升級與尼克松政府初試「中國牌」

到1969年夏天，中蘇兩國彼此視對方為主要乃至首要敵人，美蘇雖曾對話卻難以打破僵局，尼克松親自造勢表示願意與北京改善關係。

3月2日的邊境衝突發生後不久，蘇聯急於探聽美國對中蘇邊界衝突的反應。11日，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向基辛格問及美國如何看待中蘇在烏蘇里江的軍事衝突。基辛格故意表示：「這主要是中蘇間的問題，美國不想捲入。」多勃雷寧問道：「美方是否準備利用蘇聯的困難？」基辛格回答：「在美蘇關係中，我們已經多次進行認真會談，美方的態度是真誠的。但是如果蘇聯想令美國難堪或遭受屈辱，美國將會不事聲張地採取適當措施反擊。」^⑲顯然，這是在含蓄地透露美國不排除借助中國，在美蘇關係中對蘇聯施加壓力。

4月3日下午，多勃雷寧再次會晤基辛格。這次多勃雷寧比較直接地向基辛格詢問：「聽說閣下主管美國對共產中國的政策，不知美國對華的政策結論是甚麼？」基辛格回答「尚無定論」，接着又對中蘇關係火上添油：「從單純的政治角度看，中國無論由誰執政都將成為蘇聯的重大安全問題。」多勃雷寧則對中美關係煽風點火：「許多蘇聯人都認為福摩薩〔台灣〕最好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⑳

多勃雷寧的試探急切直白，印證了尼克松政府的判斷：蘇聯對中美接近甚為擔憂，中國對美蘇外交具有重大價值。對蘇聯施壓的最有力籌碼是對其打「中國牌」，但在中美相互隔絕的情勢下，美國尚未能把「中國牌」捏在手中，尼克松政府能做的也僅僅是用中美接近的前景嚇唬蘇聯。

即便如此，尼克松政府也決定對蘇聯打一打「中國牌」。4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比姆(Jacob D. Beam)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口頭通報美國對中蘇衝突的聲明：「我們對中蘇關係的惡化表示關注。美國在中蘇衝突中沒有利益，並且無意利用兩國關係的困難。從長期看，我們的確希望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並對華沙會談的中斷感到失望。如果中美大使級會談恢復或獲得其他渠道的中美接觸，本政府將一如前任政府那樣將有關情況通知蘇聯。」²²這份口頭聲明是尼克松政府第一次比較正式地就中蘇邊界衝突表明態度，大致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美國在臺面上不會介入中蘇衝突；其二，尼克松政府致力於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這無疑是以中美接近的前景對蘇聯施加壓力；其三，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將向蘇聯保持透明度，這顯然又是在安撫蘇聯。

隨着「中國牌」的打出，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已顯得十分重要，尼克松政府對中國的政治與外交保持高度關注。4月29日，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詳細評估了中共九大：「這次會議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顯示了中共高層持續存在的政策分歧，會議未能解決毛澤東與反對文革的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僵局。中共高層集中關注國內事務，缺乏關於對外政策的計劃」；在中蘇關係方面，「林彪提到中國人民已經拒絕蘇聯有關討論邊界問題的緊急呼籲」；另外，從會議公開聲明中看，「中國不認為與美國或者蘇聯的戰爭迫在眉睫」²³。應該說，美方對於中蘇不會立即開戰的判斷是準確的，但是中蘇兩國矛盾的升級卻已不可避免。

珍寶島武裝衝突發生後，蘇聯政府於3月29日、4月11日兩次知會中國政府，希望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協商。直到5月24日，中國政府才作出回應，表示願意談判²⁴。但是在九大前後，中國上下到處被「準備打仗」的氣氛所籠罩。4月28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要準備打仗」。他設想了兩種戰爭形式：邊界上的「小打」和把敵人放進來的「大打」²⁵。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準備打仗」顯然是針對蘇聯的。5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再次談到打仗問題：「現在不打仗，打起仗來，敵人打到哪裏，就在哪裏組織地方部隊。」²⁶由此可見，中國對蘇聯威脅的擔憂顯著上升了。蘇聯要求就邊界事宜展開談判，中方勉強回應，但同時毛澤東對全黨、全國發出了備戰號召，這明顯地表現出中國領導人正在把蘇聯視為頭號安全威脅²⁷。

在中國領導人高度重視來自蘇聯的威脅之際，蘇聯政府也在渲染中蘇矛盾。5月9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Andrei A. Grechko)在紀念對德作戰勝利二十四周年的命令中，把中國、美國和西德並列為蘇聯的主要敵人²⁸。隨後，中蘇兩國沿黑龍江又發生多次軍事衝突。

5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當前蘇聯最為關注與中國的關係，因為這個問題幾乎影響到蘇聯在所有其他問題上的決策。中國問題的出現令蘇聯本已吃緊的軍事經濟資源更加困難，蘇聯非常希望減輕此種壓力，但中蘇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在此種情勢下，蘇聯需要與美國及西方國家進一步緩和關係²⁹。

鑒於中蘇關係的持續緊張以及中國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意義，尼克松政府開始考慮拿出具體措施推動中美接近。6月13日，尼克松特別助理布坎南

(Pat J. Buchanan) 建議總統：美國在外交上承認阿爾巴尼亞，同時促進西德與中國的聯繫，營造美國在推動西方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氣氛，以此換取蘇聯在美蘇關係上作一些讓步。但基辛格認為，美國應慎重行事，促進西德與中國的關係可能引發西方國家傾向於承認共產中國，並影響美台關係，尼克松對此表示同意²⁹。基辛格與布坎南的分歧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內部對如何推動中美關係的不同看法，以基辛格為代表的主張採取「小步走」的意見佔了上風。

7月21日，經尼克松批准，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旅行限制。24日，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中國政府釋放兩名因駕駛遊艇從香港誤入中國領海而被扣押的美國公民，「這是中美兩國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對話」³⁰。與此同時，尼克松開始了他的環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為中國人留下一張名片」，傳播美國準備「開始同北京來往」的信息³¹。

一方面，美國試圖與中國建立直接聯繫，另一方面，美蘇關係的發展卻不如人意。蘇聯沒有讓尼克松政府感到其合作誠意，在美國亟待解決的越南問題上，蘇聯沒有給予美國急需的幫助。基辛格回憶說：「1969年同多勃雷寧的每月會晤中我有將近10次想謀求蘇聯合作來幫助結束越南戰爭。多勃雷寧總是迴避……他從不提出結束戰爭的具體建議。」1969年，美蘇關係的僵局並沒有突破性進展。在與美國對話問題上，「他們〔蘇聯〕基本上是重形式勝於重實質」³²。事實上，到該年夏天，蘇聯政府已經在醞釀改善美蘇關係。多勃雷寧回憶說：「莫斯科決定盡力與華盛頓展開對話，其主要原因在於有確切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政府正在主動向中國做出姿態。」³³顯然，尼克松政府打的「中國牌」對蘇聯產生了作用，但此種作用十分有限，畢竟中美兩國還沒有建立直接聯繫。

三 中美緩和的戰略基礎：蘇聯是最緊迫的威脅

1969年夏天，中蘇將要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迹象愈來愈明顯：部署在中國邊境上的蘇聯部隊增加到四十二個師，達一百多萬人。蘇聯的中層官員開始向世界各國中他們相識的同級官員詢問：若蘇聯先發制人，攻擊中國核設施，各國會如何反應³⁴？8月12日，美國〈國家情報估計〉對中蘇關係作出兩個重要結論：其一，這是第一次可以有理由地提問中蘇大規模戰爭是否可能在近期爆發，而且由於中國已經有能力對蘇聯形成核威脅，蘇聯有理由認為對華發起軍事打擊的最佳時間應是盡快，而非滯後幾年；其二，蘇聯在外交方面表現出為了遏制中國而願意與西方改善关系的迹象，中國也視蘇聯為迫在眉睫的敵人³⁵。13日，蘇聯部隊在中蘇邊界襲擊中國邊防軍，打死三十名中國士兵³⁶。蘇聯突然在新疆地區採取如此嚴重的報復行動，同時又明目張膽地表現出要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態度，令毛澤東改變了大戰打不起來的想法，中國開始緊急部署備戰：8月下旬，毛先後批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邊疆各地軍民「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他們的突然襲擊」³⁷。

此時尼克松政府面對的問題是：對即將到來的中蘇戰爭持何種立場？而美國的立場又取決於尼克松政府對中蘇兩國與美國國家利益的關係的認識。在8月14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尼克松就美國對華政策作出帶有革命性意義的新論斷：「基於近來的中蘇邊界事件及與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的談話，可以認為蘇聯比中國更強硬、更富侵略性」，「蘇聯可能在醞釀擊垮中國的政策」，「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中國被蘇聯擊垮後的世界對美國是否更加安全」，「本政府有理由保持中蘇間的力量平衡」。對於中蘇兩國，「亞洲國家首先更恐懼蘇聯，不接受蘇聯的集體安全安排，不希望蘇聯成為其保護國。我們必須從撇開越南問題的視角看待中國」^③。

基辛格評價說，尼克松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對於美國外交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觀點：其一，「20多年來，中國一直被〔美國〕認為是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中更好鬥的一個」，而尼克松的新觀點是「當前蘇聯對美國來說更為危險，如果在中蘇戰爭中中國『一敗塗地』，那將有損美國的利益」；其二，「一位美國總統居然宣布一個共產黨大國的生存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④。筆者認為，「從撇開越南問題的視角看待中國」顯然是指中國對美國的價值不僅僅局限在亞太，而是具有全球戰略價值。同時，這也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再認為越南問題是阻礙中美接近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

在尼克松作出上述論斷一周後，從巴基斯坦傳來有利於中美接近的信息。8月21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向基辛格提交美國駐巴使館臨時代辦的報告，巴基斯坦轉達了中國政府有意讓美國知曉的信息：中國認為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緊迫^⑤。1969年8月，中美兩國在互無聯繫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得出一致結論：蘇聯對兩國均是最大威脅。中蘇邊境戰爭的陰雲對兩國得出這個結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蘇聯的戰爭威脅迫使中國視其為當前的最大敵人；而中蘇可能發生戰爭又令尼克松政府必須作出判斷——蘇聯與中國誰更危險？其結論也是蘇聯。兩國的一致結論對中美關係改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奠定了戰略基礎。

尼克松於8月14日的對華政策論斷十分重要，但令基辛格頭痛的是：「這樣的決定該怎樣傳達出去？」華沙會談已經中斷，且中美大使級會談級別太低，不能作如此重大的宣布。因此，尼克松政府決定乾脆公開聲明：美國已決定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衝突看作影響到美國國家利益的事情^⑥。9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在美國政治學會上明確說：「兩個共產黨巨人之間在思想意識上的分歧與我們無關。但是，如果他們的爭吵升級為嚴重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件，我們則不得不深表關切。」^⑦這個講話表明了美國沒有與蘇聯合謀打擊中國，並表示不希望中蘇間發生戰爭。在中蘇核力量水平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尼克松政府的這一態度無疑有利於中國。同時，美國官員奉命宣稱美國對中蘇戰爭並非漠不關心，也不會置身事外。在中蘇關係戰雲密布的背景，尼克松政府改變了4月時對中蘇邊境衝突的態度：從原來的不介入轉變為公開聲明反對戰爭，並為此採取了外交行動。基辛格回憶說：「策劃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為對華開放政策作好心理上的鋪墊。」^⑧

到1969年8月，中美接近的戰略基礎已經十分明晰：中美兩國均認為蘇聯是各自的更大、更緊迫的威脅。尼克松政府認為中國在與蘇聯的較量中失

敗將有損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中國通過巴基斯坦使館向美國傳遞「蘇聯更為危險」的信息表明，中國政府也在考慮緩和中美關係。尼克松最為急切的是要把這張價值巨大但卻不易掌握的「中國牌」捏在手中。9月9日，尼克松與基辛格討論對華政策，尼克松談到：「我們近期向中國做出了一些友好舉動，中國沒有拒絕，應進一步採取措施，令中國在貿易地位上與蘇聯等同。」尼克松非常關心與中國在華沙的直接接觸，催促基辛格在華沙的某個外交場合直接與中國代辦對話。基辛格則保證，在華沙可以交給中國代辦一封信函，由其轉交中國使館，以便向中國領導人轉達尼克松政府願意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信息^④。

四 中蘇邊界談判與尼克松政府的反應

在中蘇上空戰雲密布之際，兩國關係似乎突然出現轉機。9月11日，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與周恩來會晤，雙方商定於近期舉行中蘇邊界問題的談判。

對於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會晤，尼克松政府於9月23日作出判斷：其一，中蘇關係的緩和進展不大：中方稱會談是「坦誠」的，蘇方表示會談「有用」，但事實上雙方矛盾突出。中方稱柯西金的到訪只是「過境訪問」，刻意低調報導此次會晤。其二，中國領導人願意接待柯西金反映了中國在外交上顯現出靈活性，這是幾個月以來中國外交一直呈現的徵兆。其三，中蘇分歧並未呈現縮小迹象^⑤。基辛格進而判斷，這次會晤並不能改變中蘇兩國關係的格局，中蘇關係已經完全走入「死胡同」^⑥。

尼克松政府的判斷是準確的。9月19日，毛澤東在上海同張春橋、王洪文談話時指示：國慶節期間各省、市的領導幹部各守崗位，不要去北京。同日晚上，毛在南京對許世友等人說得更加明白：國慶節地方、軍隊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敵人趁機消滅我們的中心^⑦。顯然，毛認為中蘇邊界談判可能是蘇聯對華發起突然襲擊的煙霧彈。既然中蘇關係難以緩和，這就為中美接觸留下了空間。

9月下旬，法國新任駐華大使馬納克（Étienne Manac'h）與周恩來會晤，告知周總理尼克松有意與北京改善關係。周恩來雖然表現出對美國強烈的不信任，但又同意美國「從中蘇戰爭中得不到好處」的觀點。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對此反應積極，認為北京的態度比一年前有所鬆動^⑧。10月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助理霍爾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向基辛格建議：「北京領導層中實用主義者正在重新取得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力，且此種影響力在加強之中」，「目前是對北京採取主動行動的時機了」^⑨。

10月，尼克松政府決定採取上台以來推動中美關係最有力的措施：取消在臺灣海峽的兩艘美國驅逐艦的常設巡邏，代之以美國其他軍艦每月輪流巡邏十五次^⑩。在對中美關係高度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表示友好，這是尼克松政府向中國發出的強烈信號。6日，格林建議理查森通過中央情報局在香港的渠道，讓北京知曉此舉意在為中美對話營造氣氛^⑪。

10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繼續評估中蘇爆發戰爭的幾種可能結果。中蘇失和令兩國只能有限地奉行反美政策，這是美國從中蘇對立中獲得的最大利益。但是，中蘇戰爭的結果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其一，「如果毛澤東—林彪治下的中國能夠在戰後繼續存在，中國對美國的亞洲利益將會產生更嚴重的威脅」，尼克松政府認為這將令中國外交更加激進；其二，「如果蘇聯成功地在中蘇邊境省份建立傀儡政權，北京可能會更有興趣與美國改善關係，但蘇聯的獲勝也將令蘇聯更難應付」；其三，「如果毛澤東—林彪對中國的統治在戰爭中被摧垮，中國可能分裂並發生內戰，美國面臨的問題將是：是否阻礙蘇聯擴大在中國的影響」；其四，中蘇開戰會導致核武器的使用，其他國家也可能被拖進戰爭，戰爭結果將使亞洲力量發生不利於美國的轉變⁶²。總之，尼克松政府認為，中蘇戰爭的幾種可能結果都將對美國不利。

五 美國與中國恢復直接聯繫

根據中蘇兩國總理的會談協議，自10月20日起，兩國開始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毛澤東堅持認為這是大戰前的煙幕，國慶節後，在京中央黨政軍領導人疏散完畢。14日，毛澤東去了武漢，16日，林彪去了蘇州，周恩來率領留守北京的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等轉移到可以防禦原子彈的西山戰備指揮中心辦公。18日，軍委前方指揮部「第一號號令」下達各有關單位，全軍或緊急疏散、或進入戰時指揮位置⁶³。

11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應對中蘇戰爭的方案，內容如下：其一，美國將公開強調對中蘇不偏不倚，不捲入爭端，催促雙方不使用核武器，命令美國部隊不對當事國採取挑釁行動。如果蘇聯使用核武器，美方將至少推遲與之進行軍備限制對話。其二，向亞洲盟友強調，不得捲入中蘇戰爭，並採取措施防止南韓或中華民國採取敵對行動。在北約，採取適當警戒措施，並向蘇聯解釋這些措施是防禦型的，不威脅東歐。其三，在越南，評估有計劃地撤出部隊，讓南越保持對河內施加最大軍事壓力的姿態。其四，強烈反對中蘇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如有情報顯示任何一方在考慮使用，美國將把此情報洩露出去，以降低動用核武器的威脅。其五，在蘇聯封鎖中國海岸的情況下，美國不會打破蘇聯的此種封鎖，僅通過外交途徑保護美國船隻在中立港口自由通航的權利，包括香港。其六，如果新疆、西藏在蘇聯幫助下出現獨立運動，美國將表示反對武力改變中國領土屬性，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美國將私下向蘇聯表達對其分割中國領土的擔憂，並警告印度，如果因干涉西藏而引起中國報復，不能指望通過《美印防空協定》(*Indo-US Air Defense Agreement*)獲得美國支持。最後，如中蘇戰爭引發中國內戰，美國將對內戰各方持不選邊站的態度⁶⁴。

可以說，在應對中蘇戰爭的方案中，尼克松政府採取了保持中立、但適度向中國傾斜的政策：反對中蘇使用核武器，這在雙方核力量水平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有利於中國；反對蘇聯武力改變中國領土屬性，雖然美國這一姿

態主觀上是反對蘇聯擴大在亞洲的利益，但客觀上有益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反對印度等有關國家趁火打劫，也有利於減輕中國的壓力。顯然，這一政策的出發點仍是推動中美接近，並體現出維護中國這支戰略力量將有益於美國的立場。

10月以來，一方面中蘇戰爭陰雲不散，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已經處在恢復直接接觸的轉捩點上。11月16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表示「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⑤。顯然，此時中國領導人已經認可尼克松政府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28日，法國駐美使館參贊貝松 (Henri Bujon) 向美國國務院東亞太平洋事務局亞洲共產主義事務辦公室主任克賴斯伯格 (Paul H. Kreisberg) 轉交一份馬納克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的談話紀要。在會談中，羅貴波認為尼克松政府的對華政策與其前任無實質區別。馬納克提醒羅貴波：「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富有新意」，中國政府可以「對尼克松政府的誠意進行試探」，但不宜置若罔聞。馬納克還評論說，是中國而非美國「關閉了對話的大門」，「尼克松政府不想利用中蘇分歧，而是想找到一條通往北京的道路」。克賴斯伯格對馬納克的講話表示感謝^⑥。

12月2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 (William P. Rogers) 致函尼克松，建議「放寬對共產中國的經濟封鎖」。羅傑斯認為：「中蘇10月20日開始在北京談判」，「雖然談判顯然進展不順，但不能排除中蘇關係部分改善的可能性」，「我方對共產中國的友好行動有利於預防中蘇更大的接近」，「中國領導層在外交上似乎存在分歧，我們這樣做可以使得主張緩和對美關係的北京領導人增強影響力」^⑦。與此同時，巴基斯坦方面向美國反饋一條重要信息：12月初，中國駐巴使館得到北京指令，代表中國政府感謝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 (Yahya Khan) 在推動中美關係方面發揮的作用^⑧。7日，中國方面又釋放兩名因從澳門進入中國水域而被扣押的美國人。基辛格評價說：「此事是中國作出的一個強烈示意」，「他們有興趣與我們進行更廣泛的交流」。「中方消息稱，釋放二人是回應美國的舉動：放寬貿易限制、停止美國驅逐艦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美國反對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建議」^⑨。

根據基辛格的回憶：「從1969年11月到1970年6月，至少有10次美國駐國外的官員在外交場合同中國官員搭了話。這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以前，只要中國人一知道他遇到的是美國人，他們就總是馬上中斷接觸。在這些場合中，至少有四次是中國官員主動接觸的。」^⑩而打破中美外交局面堅冰的是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 (Walter J. Stoessel, Jr.)。12月3日，斯托塞爾在華沙的一個外交招待會上，通過中方翻譯向中國駐波蘭使館代辦雷陽表示「尼克松總統希望與中國進行嚴肅、具體的談判」，雷陽答覆會盡快把此口信向北京轉達。當天晚上周恩來看到波蘭使館的電文，立刻報告毛澤東：「找着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到敲門磚了。」^⑪從這段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的話語裏不難看出兩層含義：其一，中國領導人同美國領導人一樣，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兩國的直接接觸；其二，直接接觸只是「敲門磚」，要用它敲開的是中美關係逐漸正常化的大門。顯然，到1969年12月，毛澤東與周恩來已經作出決定，要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



1970年代中期的毛澤東與基辛格。(圖片由張碧坤提供)

12月10日，中國駐波蘭使館電話告知美國使館，希望明天會晤。11日，斯托塞爾大使赴中國代辦雷陽住所晤談（此時中國大使不在波蘭），雙方商討在1970年1月恢復大使級會談^②。12日，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Khwaja M. Kaiser）時說：「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美國大使在華沙向我進行試探……對美關係，中國的立場一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去。」^③這段談話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提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美國發展關係。1970年1月8日，中國駐波蘭使館外交官前往美國使館晤談，給美方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中方重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雷陽代辦提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個在1950年代中方外交的主題在文革中成為可憎之物」。這意味着「中方外交出現更具實用主義的風格」，「共產中國內部有從強調激進外交上轉向的苗頭，中方領導人很有可能保持目前實用主義的外交路線」^④。1970年1月20日，中斷近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恢復。

六 結論

尼克松政府與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需要恢復中美外交聯繫，這是1969年中美關係重要的、也是顯著的特徵。但是兩國的接近難以直線推進，兩國間舊有的敵對誤解、國內存在的反對因素以及對盟友的政策需要，均令中美作出恢復外交聯繫的決定較為困難。1969年發生的中蘇邊界衝突，極大地改變了中美兩國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認知，有力推動了中美兩國政府克服阻力，重建聯繫。

1969年，是一個對國際關係影響深遠的年份：其一，1969年，中蘇發生嚴重的邊界武裝衝突，中國在外交上開始表現出願意與西方國家建立更多聯

繫的跡象；與西方國家接近將開啟中國外交的新階段。這一年中國外交充滿變數，中國全年都處在戰爭陰雲之中，但周恩來卻重提中國外交擱置多年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蘇邊界爭端也同樣推動了中國外交的調整，「考慮到這次戰爭危機畢竟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毛澤東毅然拋棄意識形態顧慮，重新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拾起統一戰線、「以夷制夷」的法寶^⑥。中國外交的務實性因素從彼時起逐漸加強，走出僵硬的意識形態對抗、日益靈活務實成為中國外交的新面貌。其二，1969年，中美兩國政府各自得出相似的結論：蘇聯是最為危險的敵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戰略基礎隨即顯現，這個基礎成為往後十年中美接近的動力源。其三，1969年，尼克松政府謀求對蘇聯打「中國牌」，認為中國這一因素能夠對美蘇關係以至全球冷戰產生重大影響。這似乎預示着一種歷史遠景：中國這樣的國家必然要在國際關係中發揮全球性大國作用。基於對「中國牌」戰略意義的認知，三年後，尼克松訪華並接受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這一原則在以後四十多年的美國對華政策中一直沒有打破。究其本源，1969年的歷史經驗對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原則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69年，中美、中蘇、美蘇關係的一系列互動，推動中美兩國相向而行、重建聯繫，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開始形成。從中國角度看，這個戰略大三角關係是中國拋棄對蘇聯「一邊倒」、打開與西方國家關係大門的開始；從美國角度看，是其重新建構對華政策的起點；從蘇聯角度看，它沒能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中美兩國接觸，逐漸在中美蘇三方關係的互動中陷入被動。1969年恢復接觸的中美兩國逐漸走進一個新的時代。

註釋

①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79);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William P. Bundy,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8);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下引此書簡稱FRUS), vol. 17, *China, 1969-1972*, ed. Steven E. Phillip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③ Yang Kuis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1, no. 1 (2000): 21-52; William Bur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Sino-Soviet Border War and Steps towards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1, no. 3 (2001): 73-112; Lyle J. Goldstein, "Return to Zhenbao Island: Who Started Shooting and Why it Matter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8 (December 2001): 985-97; Chris Connolly, "The American Factor: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 the Vietnam War, 1968-72", *Cold War History* 5, no. 4 (2005): 501-27; Yafeng Xia, "China's Elite 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January 1969–February 1972”,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8, no. 4 (2006): 3-28; Kuisong Yang and Yafeng Xia, “Vacill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Détente: Mao’s Changing Psyche and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Diplomatic History* 34, no. 2 (2010): 395-423; 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39-50；劉志男：〈1969年：中國戰備與對美蘇關係的研究和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41-57。

④ 加迪斯 (John Gaddis) 著，時殷弘等譯：《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頁311。

⑤ Henry A. 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 3 July 1969, in *FRUS*, vol. 17, 42, n. 2.

⑥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27 February 1969, in *FRUS*, vol. 12, *Soviet Union, January 1969–October 1970*, ed. Erin R. Maha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70-71, 79-83.

⑦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27 February 1969, in *FRUS*, vol. 17, 16-17.

⑧⑨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6 March 1969, in *FRUS*, vol. 17, 23; 22-24.

⑩ “Editorial Note”, in *FRUS*, vol. 17, 51.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29；230；234；237；253；267；270-71。

⑲ 關於中蘇邊界衝突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主要觀點如下：其一，珍寶島衝突是中國對蘇聯製造邊界事件的一種反應，此後中國尋求改善中美關係是「中蘇緊張局勢事實上緩和」帶來的「一個有國際意義的副產品」(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頁2-12)；其二，毛澤東在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過程中，利用了中蘇邊界爭端(參見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頁39-50)；其三，1969年3月的中蘇珍寶島衝突後，毛澤東並沒有立即作出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決定(參見牛軍：〈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頁66-77)。

⑳㉑ 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係紀事(連載一)〉，《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119。

㉒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1 February 1969, in *FRUS*, vol. 17, 7.

㉓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19 March 1969, in *FRUS*, vol. 12, 96.

㉔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3 April 1969, in *FRUS*, vol. 12, 123.

㉕ “Oral Statements by the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Beam)”, 22 April 1969, in *FRUS*, vol. 12, 140.

㉖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29 April 1969, in *FRUS*, vol. 17, 28-29.

㉗㉘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99；338-39。

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359。

㉚ 關於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開始視蘇聯為中國最大的威脅的觀點，參見牛軍：〈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頁72。

㉛㉜㉝㉞㉟ 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一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222；226；182-83；234；235。

㊱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Nixon”, 22 May 1969, in *FRUS*, vol. 12, 162.

㊲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26 June 1969, in *FRUS*, vol. 12, 189-90.

㊳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年中美關係的演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42。

- ⑳ 多勃雷寧 (Anatoly F. Dobrynin) 著，肖敏等譯：《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 231。
- ㉔㉕㉖㉗㉘ 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 210；211；211-12；212；212。
- ㉙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12 August 1969, in *FRUS*, vol. 17, 66.
- ㉚㉛ Chris Tudda,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 36.
- ㉜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 1562；1626。
- ㉞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4 August 1969, in *FRUS*, vol. 12, 225-26.
- ㉟ “Memorandum from Lindsey Grant and Hal Saund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21 August 1969, in *FRUS*, vol. 17, 69-71.
- ㊱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9 Sept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80-81.
- ㊲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23 Sept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86-87.
- ㊳ Manac’h, *Memoires d’Extreme Asie*, 460-64; Paris embassy cable 14940 to State Department, 30 September 1969, Subject Numeric Files, 1967-69, POL Chicom-Fr; 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Next Steps in China Policy”，6 October 1969, SN 67-69, POL Chicom-US. 轉引自 William Bur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9”，96。
- ㊴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8 Octo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04.
- ㊵ William Bur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9”，96.
- ㊶ “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17 Octo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10-12.
- ㊷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Report”，10 Nov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18-21.
- ㊸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reisberg and Henri Bujon”，28 November 1969。轉引自 Chris Tudda,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38。
- ㊹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 to President Nixon”，2 Dec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40.
- ㊺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23 Dec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54.
- ㊻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154, n. 4.
- ㊼ 耿飜：〈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和奠基者〉，載《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 15。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四卷 (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頁 2045。
- ㊽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20 December 1969, in *FRUS*, vol. 17, 152.
- ㊾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12 January 1970, in *FRUS*, vol. 17, 161-62.
- ㊿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 455。

代 兵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

張碧坤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技術部助理工程師